

中国禁毒大视角

贺晓东 方明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 京

谨以此书献给

最敬爱的老师孙尚清先生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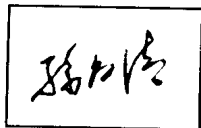
前年年初,云南省思茅地区一位领导和方明同志曾到办公室同我谈过云南省和边疆民族地区禁毒与经济发展的问题,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我国早在 1952 年就已解决了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毒品问题。可是近几年来,毒品的问题又在一些地区死灰复燃,且有向内地蔓延的趋势,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我们目前所面对的毒品问题与过去相比有很大的不同,由于毒源地在国境线以外,难以做到肃本清源。所以,反毒品的斗争看来是长期的、复杂的。

禁毒,不仅是政法部门一家的任务,而且是全社会都必须面对的大课题。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毒品也是一种商品,它的运动也受经济规律的支配,毒品问题的产生也有其经济根源。国际上禁毒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对毒品问题,单纯地从执法的角度进行打击是不够的,还应当在执法机构强化职能作用的同时,依靠政府中各个部门、企业和事业单位,依靠全社会的力量,充分运用政治的、经济的、教育的、行政和法律的各種手段和方式来积极地消除毒品犯罪的各种因素和条件。这其中,也包括通过国际合作的途径,运用替代改植的办法,解决境外毒源的问题。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贫困和毒品问题交织在一起,形势的确很严峻。经济发展是个大课题,禁毒也是一个大课题,两者实际上是有联系的。怎么样在经济发展和禁毒工作之间建立一种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关系,使两个课题都能有圆满的答案,这个问题边疆地区的同志在思考,首都理论界的一些同志也在思考。

贺晓东博士是我的学生,他前年从日本回国后即投身于云南省边疆地区禁毒与经济发展的研究。两年来,他和方明同志一起在云南省和北京市的一些政府机构和社团组织的支持下,组织了“中国禁毒”课题研究组,在毒品问题较严重的西南、西北数省做了大量的调查工作,搜集了许多资料,在此基础上写出了《中国禁毒大视角》一书。在此书中,作者从历史、国际、经济、社会、法律等不同的角度考察了我国的毒品问题,介绍了我国禁毒工作开展的情况及所取得的成果。作者对毒品问题产生的根源以及禁毒工作所面临的问题进行了深刻的经济学思考,并根据我国和国际上毒品问题的特点,提出了一些可操作的对策、建议。作者的一些观点是否正确,是否反映了问题的实质,当然还有商榷的必要。不过,作为我国目前少有的、较全面的禁毒研究专著而出版,该书不仅会对广大群众起到良好的宣传教育作用,而且还将推动理论界对禁毒问题作进一步的研究、探讨。



1996年4月17日于北京

目 录

第一篇 中国的毒品问题

第一章 毒品侵入与近代中国	(1)
一、近代史的初章:烟毒与鸦片战争	(1)
二、反毒意识与民族意识	(8)
第二章 建国之初的禁毒运动	(14)
一、建国之初的大扫毒	(14)
二、禁毒运动身后留下的经济真空	(20)
第三章 面对新的严峻课题	(25)
一、毒潮重起	(25)
二、毒品最初泛滥于滇缅边境	(29)
三、大凉山的叹息:贫困与毒品结盟	(33)
四、白魔已过玉门关	(36)
第四章 从国际角度看中国毒品问题	(41)
一、世界性的毒品问题及其动态	(41)
二、世界上主要的毒品及其地区分布	(50)
三、毒品问题的国际坐标系	(56)
第五章 中国的吸毒问题	(71)
一、中国的瘾君子群落	(71)

二、中国有多少吸毒者？	(76)
三、中国毒品的消费量与消费额	(81)
四、地域分布及消费特点	(85)
五、吸毒者结构分析	(91)
六、致命的一跃：从鸦片到海洛因	(96)
七、海洛因与艾滋病感染的关系	(100)
 第六章 中国的贩毒问题	(105)
一、中国贩毒问题的背景	(105)
二、毒品“借道”——大规模、集团化的国际贩运	(107)
三、国内毒品的地下交易	(111)
四、贩毒与贩枪——枪毒同源、枪毒合流	(120)
五、“独立王国”——平远街	(124)

第二篇 中国的禁毒形势

第七章 中国政府的禁毒立场及战略方针	(128)
一、中国政府坚定地站在禁毒立场上	(128)
二、中国禁毒工作的战略方针	(132)
 第八章 锋利的“中华之剑”	(140)
一、中国缉毒斗争的几个特点	(140)
二、“中国通道”是国际毒贩的死路	(144)
三、国门拒绝毒品	(149)
四、大法之下，法不容情 ——兼论东西方禁毒法规的差异	(152)
五、各地的扫毒行动	(158)
六、世界反毒斗争与中国	(166)
 第九章 戒毒工作现状的点与面	(170)

一、小议禁吸、戒吸法规及戒毒方法	(170)
二、我国的“四层次”戒毒体系	(173)
三、戒毒效果与一些通行戒毒方法的探讨	(176)
四、从戒毒效果看戒毒体系的薄弱环节	(179)
五、一个县级强制戒毒所	(181)

第三篇 困惑、思考与对策

第十章 禁毒中的困惑	(186)
一、怪圈：禁毒报捷、吸贩毒报忧	(186)
二、戒毒：背不起又甩不掉的包袱	(188)
三、道高还是魔高？缉毒装备之咏叹	(191)
四、资金黑洞：禁毒需要花多少钱？	(198)

第十一章 禁毒的经济学思考	(204)
一、种种禁毒经济学说	(204)
二、屡禁不止与经济法则	(208)
三、戒吸工作的难点与思考	(213)
四、关于毒品问题与经济问题相联系的观点	(215)
五、毒品问题的经济根源	(219)
六、关于“大禁毒”的对策思路	(220)

第十二章 思茅的案例：问题与对策	(228)
一、落后经济的特征	(228)
二、负向循环的财政系统	(230)
三、三种循环关系	(231)
四、贫困问题与毒品问题循环陷阱的一般模式	(232)
五、地委书记“治本”的思路	(234)

第十三章 跨世纪的国际工程：肃毒扶贫、替代改植	(236)
-------------------------------	-------

一、“金三角”地区毒品生产沿革及目前态势·····	(236)
二、思茅南亚基金会与缅甸佤邦的试探性接触·····	(240)
三、思茅—佤邦合作改植计划的整体策划·····	(241)
四、项目进展·····	(243)
五、舆论界的反应和专家学者的评价·····	(246)
附录一：台湾的毒品问题·····	(248)
附录二：台湾反毒机构及有关法律措施·····	(251)
附录三：云南省思茅地区农科所向联合国禁毒署提 交的《罂粟替代农业与植物引进研究》计 划书(1994年9月)·····	(256)
附录四：泰国的毒品控制与改植计划·····	(262)
后记·····	(272)

第一篇 中国的毒品问题

第一章 毒品侵入与近代中国

一、近代史的初章：烟毒与鸦片战争

近代中国似乎与毒品有着某种不解之缘。在上一世纪鸦片贸易兴起的时候，中国曾是世界上最大的鸦片输入国，也曾是世界上最大的鸦片消费国。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鸦片汁已经把清朝道光皇帝统治的中国版图涂成了烟灰色。有这样一幅曾流行于西方世界的漫画：一个后脑勺拖着一条长长辫子的中国人，嘴里叼着一杆长长的鸦片烟枪，面黄肌瘦，形容枯槁，精神萎顿。此漫画起名为“东亚病夫”。“东亚病夫”的寓意就是大烟鬼。“东亚病夫”在那时代就是中国人的代名称，也是中国的代名称。

鸦片烟毒，是近代中国苦难的象征、耻辱的象征。它所造就的“东亚病夫”的形象，使今天的每一个炎黄子孙仍然痛心疾首。然而，这一沉重的历史包袱我们的先辈竟背了足足有一个世纪。

中国、鸦片；鸦片、中国……当一个黄皮肤、黑头发的中国人看到这两个熟悉的字眼并列在一起，或从某一个来自西方国家的人的嘴里说出来时，他或者她的第一个反应里不仅仅有着痛心和耻

辱,更多的还是愤恨。因为,在英文里“china”是磁器的意思,而大写的“China”则是丝绸、茶叶、纺织品、磁器的故乡,是世界上四大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是一种文明的代名词,与“Opium(鸦片)”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把这两者扯在一起的不是中国人自己,而是西方侵略者。

运送磁器、丝绸、茶叶的大货船,在伶仃洋海面上颠簸着向外海驶去,那是中国的远洋货船。同时,满载鸦片的三桅趸船,在翻滚的海浪中时隐时现,悄然向珠江口驶来。开始是两三艘,以后越来越多,以至成群结队。那是英国的船只,时间是1773年。再往后,货船换成了炮舰,向广州、威海等中国港埠扑来,时间是1840年。于是,我们这个本没有鸦片的泱泱大国,从此便播下了毒品祸根。

西方列强特别是大英帝国,无视当时中国政府的禁令,先是以鼠窃狗偷行为和海盗行为,通过武装走私、宗教走私、贿赂满清地方官员走私,把鸦片越来越多地输入中国,继而在中国坚决的禁烟运动面前,英国政府从罪恶的鸦片贸易的幕后公开地跳到了台前,用炮舰打开了中国的门户。1840年2月,英国内阁正式决定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竟然用国家之间的战争行为,把鸦片烟毒强加于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这是人类文明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历史老人在这里重重地一笔,把自诩为文明国家而实则为武装贩毒集团的“女王陛下政府”永远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在有关中国近代史的所有书籍中,最前面的章节肯定是关于西方列强可耻的鸦片贸易和中国正义的禁烟运动的内容。

鸦片,大约在公元800年左右(唐代贞元时期)从阿拉伯输入中国,阿拉伯人称之为“阿芙蓉”。到了宋代,苏轼及其弟子在诗文中又称之为“莺粟汤”、“鸡粟水”。明代中叶以后,中国才根据“Opium”音译为“鸦片”。由于鸦片含有大量的生物碱(吗啡、可待因、那可汀等),有提神、镇痛、止泻、辟障等作用,因此,《本草纲目》等药书把它列为药材。在长达1000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本土并



这是盛开的罂粟花，它的果实制品就是鸦片。150多年前，英国殖民者用大炮轰开了中国大门，把鸦片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使中国从此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导致旧中国贫穷落后，任人宰割，蒙受“东亚病夫”的耻辱。

无大面积种植罂粟，中国人一直拿它作药材进口。最初，中国人只是吞其籽，食其壳。明朝末年，才有人把它的浆跟旱烟末和成丸来吸食，但因进口量小，吸食鸦片者仅为个别。清初，康熙时期也是当作药材进口，后来雍正皇帝下令禁止吸食鸦片。乾隆以后，政治转向腐败，官员们开始吸食纯鸦片，于是上行下效，民间出现了烟馆。但是，即使是腐败如清王朝和民国政府，中国的任何一届政府都从未对鸦片烟毒开禁。与此相反，可恶的鸦片贸易一开始就是在西方列强政府的默许甚至策动下进行的，是一种带有强烈的政府背景的行为。英国鸦片商人曾毫不隐讳地说：“我们应当承认鸦片贸易的本身，是经(英国)最高当局准许的。”^①

① 《英国蓝皮书》，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2册第645页，中华书局，1979年11月。

在 1767 年以前(乾隆时代),主要是葡萄牙人从土耳其把鸦片贩运到中国。当时由英国商人从印度向中国输出的鸦片不超过 200 箱,每箱约重 133 磅。当时中国的法律许可输入鸦片供医疗用,每箱鸦片纳税 3 美元左右。可是,狡诈的英国人已经发现了毒品贸易是一本万利的买卖。早在 1757 年,英国在印度的殖民机构——东印度公司占领了孟加拉,强迫印度农民种植罂粟,并为之提供贷款。它还取得了制造鸦片的垄断权力和鸦片的专卖权。由英国直接控制的印度政府——英印政府直接操纵、控制并展开了鸦片生产和贸易。还派了大批官方侦探来监视一切;以诱胁来迫使印度农民栽种罂粟,把割下来的生鸦片交付到指定地点,将其进一步加工成适合中国鸦片吸食者口味的鸦片制品,然后把鸦片制品装入便于走私偷运的特制箱内,之后运到加尔各答。在那里,鸦片由政府统一标价拍卖并由国家官吏把鸦片移送给投机商人,然后由投机商人转给走私商人,由走私船运往中国。英国政府在每箱鸦片上所花的费用将近 250 卢比,而在加尔各答市场上的批发价格是每箱 1210—1600 卢比,约获 500% 的暴利。然而,英国的政府行为并没有到此为止,它还利用国家间的关系和自己的强权地位,公然干涉中国内政,保护毒品走私贩子。用马克思的话说:“这个政府并不满足于这种实际上的共谋行为,它直到现在还直接跟那些从事于毒害整个帝国(中国)的冒险营生的商人和船主们合伙,分享利润和分担亏损。”^①

外国鸦片贩子从 18 世纪下半叶开始,在其本国政府明里暗里的支持下,大规模地向中国贩运鸦片,每年的贩运额都大幅度上升。1816 年对中国的鸦片贸易总额已将近 250 万美元,1820 年偷运至中国的鸦片增加到 5147 箱,1821 年达到了 7000 箱,而 1824 年达到 12639 箱。从 1824 年到 1834 年的十年间,每年偷运进中

① 《鸦片贸易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 年版,第 1 卷第 719 页。

国的鸦片又从 12639 箱上升为 21785 箱。到 1838 年向中国输入鸦片达 40200 箱。从 1820 到 1838 年仅 18 年时间, 鸦片的输入量增加了 7 倍多!^① 这些鸦片的绝大部分是英国鸦片贩子从印度输入中国的, 有一少部分是美国鸦片贩子从土耳其贩运来的。此外, 从 1830 年起, 沙俄也由中亚向中国输入鸦片。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失败后, 鸦片输入量显著增加, 40 年代平均每年输入 3.7 万至 4 万箱, 50 年代平均每年输入 6.8 万箱, 仅 1855 年即为 7.8 万箱。1860 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再次失败后, 鸦片输入中国的数量就难以计数了。

鸦片贸易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十分严重的。中国是贸易出超国, 号称“世界工厂”的英国的洋货在中国很难打开销路。直到 18 世纪中叶以后, 英国的对华贸易, 每年的逆差额仍在 200 万银元左右。中国的生丝、丝织品、茶叶、土布、大黄在外国市场上都很畅销。鸦片大量输入中国以后, 中英之间的贸易逐渐发生了变化, 英国由入超变为出超。它通过鸦片贸易, 从中国运走了越来越多的现银。从 30 年代起, 在英国输入中国的货物中, 鸦片占了 1/2 以上, 英国每年从中国掠走的白银达数百万两。在鸦片战争前的 40 年间, 仅英美鸦片商通过鸦片贸易从中国掠夺走的白银即达 4 亿银元。鸦片战争以后, 白银流出多少只有天知道了。鸦片贸易严重消耗着中国社会的财力, 使社会购买力低下, 工商业萧条凋敝, 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合法贸易, 因为中国不能同时既购买商品, 又购买毒品。这种状况甚至引起了以中国为市场的英国人的关切。马克思引用了 1847 年英国下院一个委员会为调查中英贸易关系状况提出的报告的一段, 报告称: “可惜我们应当承认: 近来同这个国家的贸易处于十分不能令人满意的状态, 扩大我们交往的结果并没有证实我们的合理期望, 自然, 这种期望是以自由进入这个蔚为

^①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第 1 卷第 238—239 页。

壮观的市场为依据的。我们认为,妨碍这种贸易发展的根本不是由于中国不需要英国商品,也不是其他国家日益增长的竞争;花钱买鸦片——这消耗了所有的白银而使中国人一般的贸易遭受巨大的损失;他们不得不用茶叶和丝来偿付其他商品。”^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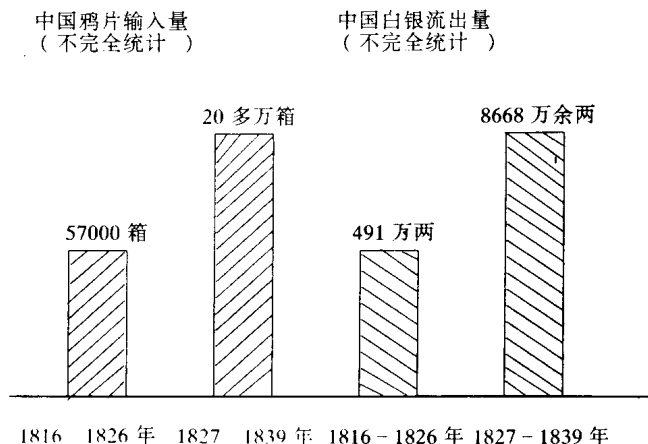


图 1-1 中国鸦片输入量与白银流出量的对比

从 19 世纪初到鸦片战争前夕,英美等西方国家的鸦片贩子通过走私向我国大量输入鸦片,1827—1839 年 12 年间输入的鸦片量竟比 1816—1826 年 10 年间输入鸦片量高 3 倍。鸦片的大量输入,导致中国白银滚滚外流,造成清政府严重的财政危机和一系列严重的经济社会危机。1827—1839 年 12 年间白银流出量达 8668 万余两,是前 10 年即 1816—1826 年 10 年间白银流出量的 18 倍。

鸦片贸易还加速了满清政府的政治腐败。马克思指出:“中国人在道义上抵制的直接后果是英国人腐蚀中国当局、海关人员和一般的官员。浸透了天朝的整个官僚体系和破坏了宗法制度支柱

① 《鸦片贸易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24 页。

的营私舞弊行为,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上被偷偷带进了天朝。”^① 鸦片烟贩对中国官员的贿赂达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嘉庆时,两广总督兼代理关务的百龄从每箱鸦片能得到 40 元的好处费。道光时,两广总督李鸿宾每月收贿银 36000 两。英商还收买了水师副将韩肇庆,让韩用兵船代运鸦片,每万箱中送给韩几百箱。甚至朝廷里的大官如军机大臣穆彰阿等为首的许多大臣也从鸦片走私中大捞外快。不独如此,鸦片烟毒还严重侵蚀着整个统治机构。1831 年刑部奏称:“现今直省地方,俱有食鸦片烟之人,而各衙门为尤甚,约计督抚以下,文武衙门上下人等,绝无食鸦片烟者,甚属寥寥。”^② 不仅许多文官武将成了大烟鬼,而且宫廷内部也发生了吸食鸦片的现象。据传说,连道光皇帝本人也一度染上鸦片烟瘾。鸦片贸易使清政府吏治愈加腐败,军队更加失去战斗力,进一步加深了社会经济、政治危机。

鸦片烟毒对中国社会各阶层以至对百姓肉体 and 精神的毒害都十分严重。当时清朝统治下的全国各地,从沿海地带的广东、福建、浙江、山东、广西到西北的陕西、甘肃、山西;从南部的云南、贵州到北部的黑龙江、盛京、直隶、天津、北京,无一不弥漫着鸦片烟毒。清朝的京官、外官、幕宾、吏胥、贵戚、旗丁、太监、绿营官兵、娼妓、优伶、尼姑、和尚、道士等,不少人变成了面色铁青、骨瘦如柴的大烟鬼。一些市民、农民等也逐渐成了瘾君子。道光十五年,全国有 200 万人吸大烟,沾染烟毒者不下 1000 万。

英国政府明目张胆地支持、纵容英国毒品贩子大肆对华进行鸦片走私,从中获利,是丧尽道义的,就连当时的英国人蒙哥马利·马丁都这样写道:“可不是吗,同鸦片贸易比较起来,奴隶贸易是仁慈的;我们没有摧残非洲人的肉体,因为我们的直接利益要求保持

① 《鸦片贸易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26 页。

② 《中国近代史》第 8 页,中华书局,1979 年第 2 版。

他们的生命；我们没有败坏他们的品格，没有腐蚀他们的思想，没有毁灭他们的灵魂。可是鸦片贩子在腐蚀、败坏和毁灭了不幸的罪人的精神世界以后，还折磨他们的肉体；贪得无厌的摩洛哥人时时刻刻都要求给自己贡献更多的牺牲品，而充当凶手的英国人和吸毒自杀的中国人彼此竞争着向摩洛哥的祭台上贡献牺牲品。”^①

二、反毒意识与民族意识

中国近代史开篇，正值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到了一个新时期（更疯狂地攫取海外殖民地、大搞走私活动和商品输出时期），而仍处于没落封建社会制度下的中国就成为一块肥肉，落在西方列强的利爪之下。在中国，说到鸦片，总有一种象征意义，那就是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欺侮、侵略、掠夺和中国民族的屈辱与痛苦。中国人的民族意识是十分强烈的，外来的毒品被打上了外来侵略的印记，势必会激起中国人强烈的反抗意识。因此，在中国人的反毒品意识中自觉不自觉地掺杂了大量的民族意识，也可以说，中国人的反毒品意识是其民族意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一贯把反毒品的林则徐当成民族英雄，把林则徐在虎门的销烟活动看作近代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先声。反毒、禁毒与爱国，开放烟禁与卖国，在关于近代中国的史学上几乎成为两个恒等式，是判别掌权的官僚们到底是爱国还是卖国的重要依据。尽管这条标准在史学界有些争议，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它反映了中国人对毒品问题的价值取向。

中国历史上从清朝经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历代历届政府无论其性质多么不同，但在禁毒方面，却惊人地一致。它们对毒品问题所持的一贯严厉的态度，与大多数西方国家所持的较为宽容的

^① 《鸦片贸易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3—24页。

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虽然从清朝雍正帝开始明令禁止吸食鸦片,可是打击毒品的重点还是放在贩卖环节上。结果如马克思所说:“东印度公司一手扶植的、虽经北京中央政府禁止而无效的鸦片贸易的规模日益增大……。在这个时候,中国政府向外国商人提出严重抗议,同时惩办了一些与外国商人同谋共犯的行商,大力查办了本国的鸦片吸食者,并且在本国海关内采取了更严厉的措施。所有这一切努力的最终结果,正像 1794 年一样,只是使鸦片堆栈由不可靠的地点移到更适合于经营鸦片贸易的地点。鸦片堆栈从澳门和黄埔转到了珠江口附近的伶仃岛;在那里,具有全副武装设备的、配备有很多水手的船只,成了固定的鸦片堆栈。同样地,当中国政府得以暂时禁止广州原有的窑口(私卖鸦片烟的店铺——编者注)营业时,鸦片贸易只是转了一道手,转到比较小的商人手里,他们不惜冒着一切危险采用任何手段来进行这种贸易。”“它们干得非常起劲,以致不顾天朝的拼命抵制,在 1837 年就已将价值 2500 万美元的 3900 箱鸦片顺利地偷运入中国。”^① 清政府的禁烟政策与英国政府的鸦片贸易利益是直接抵触、针锋相对的。马克思指出:“这里有两件事要注意:第一,从 1816 年起,在英国对中国的出口贸易的每一个发展阶段上,走私的鸦片贸易总是占着大得极不相称的比例。第二,就在英印政府对鸦片贸易商业性利害关系逐渐消失的同时,英印政府对这种非法贸易在财政上的利害关系却日益增加了。”^② 清朝政府在这里并未做任何退让,而是采取了更加坚决的措施,不仅加强了对贩毒的严刑峻法,而且为了压制毒品的消费需求,还酝酿着采取“重治吸食”,即将吸食毒品者一律处以死刑的极端严厉的办法。时任湖广总督的林则徐对此法就大加赞许,他

① 《鸦片贸易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26—28 页。

② 《鸦片贸易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28 页。